

国际安全研究译丛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美〕亚历山大·B. 唐斯 / 著

Alexander B. Downes

战争中的平民

TARGETING

李明杰 / 译

CIVILIANS

IN WA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美〕亚历山大·B. 唐斯 / 著

Alexander B. Downes

战争中的平民

TARGETING

李明杰 / 译

CIVILIANS

IN WA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中的平民 / (美) 亚历山大·B. 唐斯
(Alexander B. Downes) 著; 李明杰译. -- 北京: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6
(国际安全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 Targeting Civilians in War
ISBN 978-7-5201-0656-6
I. ①战… II. ①亚… ②李… III. ①国际关系-研
究 ②战争史-研究-世界 IV. ①D81 ②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6060 号

· 国际安全研究译丛 ·

战争中的平民

著 者 / [美] 亚历山大·B. 唐斯 (Alexander B. Downes)
译 者 / 李明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 娟 孙连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337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656-6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6-398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argeting Civilians in War, by Alexander B. Downe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2008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根据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译出

致 谢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许多朋友向我提供了帮助，给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我特别感谢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前往芝加哥大学求学，希望成为一名政治学者。而在此之前，我是一名古典音乐家，大部分时间我在练习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而约翰·米尔斯海默却希望把我培养成国际关系学者。他收下了我，我无限感激。本书每一次修改后约翰·米尔斯海默都要通读，而且会给出非常有帮助的意见和建议，这使本书得到极大的完善。

如果没有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的帮助，我也根本不可能写完这本书。在2001年1月的一次头脑风暴上，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能证明民主国家在战争手段方面更有道德，那将非常了不起。”他对我说。关于民主国家在战争中对平民造成的影响这个问题，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罗伯特·佩普的热情。我非常感谢他的支持。查尔斯·格拉瑟（Charles Glaser）和斯塔希斯·卡里瓦斯（Stathis Kalyvas）不仅给予我鼓励，而且帮助我完善论证过程，这使本书的论点更有说服力。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有些人帮助我启发灵感，有些人给予我切实的帮助。例如，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在许多方面是开路先锋，他写了很多有关大屠杀的书，是他把迫害平民研究发展成安全研究的主流。在这本书写作之初，我就与本杰明开始接触。一路走来，他对本书提出了非常有帮助的意见和建议，而且给予了我莫

大鼓励。有他在前面引路，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伊万·阿诺金-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对非对称冲突中发生的野蛮行径很有研究，他毫不吝啬地与我分享这些数据，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对我的鼓励。贾森·卡斯蒂略（Jasen Castillo）、凯利·格林希尔（Kelly Greenhill）和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不仅对我的写作思路提出大量反馈意见，而且给予我关心、支持和安慰，对此我万分感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罗杰·海顿（Roger Haydon）对本书非常感兴趣，而且对部分章节提出了许多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非常感谢。

我还要向这几年来阅读过本书的草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他们是：拉亚·巴尔塞尔斯（Laia Balcells）、巴顿·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ein）、凯瑟琳·科克伦（Kathryn Cochran）、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马修·费尔斯（Matthew Fehrs）、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克里斯托弗·格尔皮（Christopher Gelpi）、海恩·乔曼斯（Hein Goemans）、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科林·卡尔（Colin Kahl）、罗伯特·基奥恩（Robert Keohane）、海伦·金塞拉（Helen Kinsella）、格雷戈里·科布伦茨（Gregory Koblentz）、马修·科赫尔（Matthew Koblentz）、埃里克·穆基耶赫（Eric Mvukiyehe）、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丹·瑞特（Dan Reiter）、托马斯·斯普拉根斯（Thomas Spragens）和伊丽莎白·伍德（Elisabeth Wood）。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我帮助特别大。对于那些没感谢到的朋友，我表示歉意。

好几家机构对我鼎力支持，使我可以安心从事研究和写作。我在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待了一年，收获颇丰。感谢史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和莫尼卡·达菲·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他俩给我提供参与奥林战略研究所研究项目的机会，使我可以查阅哈佛大学的许多资料。之后，斯坦福

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CISAC）为我提供了一年支持，在这里，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和林恩·伊登（Lynn Eden）给予我指导，使我受益匪浅。其间，艾森豪威尔研究所“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克利福德·罗伯茨研究生奖学金”（Dwight D. Eisenhower/ Clifford Roberts Graduate Fellowship）为我提供了资助，哈里·弗兰克·古根海姆基金会（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则为我提供了论文奖学金。我还要感谢杜克大学三角区安全研究所（Triangl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和艺术与科学研究理事会（Arts and Sciences Council for Faculty Research），这两家机构都在本书最后阶段提供了资金支持。

本书引言和第一至第三章部分内容来自我之前发表的文章《绝望的时期，绝望的措施：战争中迫害平民之原因》^①。第二章部分内容来自《制约还是助推？国家间战争中的民主与平民死亡》^②。第五章中关于第二次布尔战争的部分内容来自《把坟墓填平，把海水抽干：无差别暴力作为反叛乱战略之效果分析》^③。感谢上述期刊及出版机构允许我对文章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并在本书中出版。

我在杜克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得到了很多帮助，对此，我要感谢崔洙军（Soo - Jung Choi）、马克斯·安特曼（Max Entman）和查德·特鲁普（Chad Troop），特别要感谢凯瑟琳·乔丹（Katherine Jordan）。凯瑟琳·乔丹积极帮助我修改和完善本书终稿，帮助我改正了大量错误。对于书中仍存在的一些错误，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① “Desperate Times, Desperate Measures: The Causes of Civilian Victimization in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no. 4 (spring 2006): 152 - 195.

② “Restraint or Propellant? Democracy and Civilian Fatalities in Interstate Wa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1, no. 6 (December 2007): 872 - 904.

③ “Draining the Sea by Filling the Graves: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iscriminate Violence as a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Civil Wars* 9, no. 4 (December 2007): 420 - 444.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布赖恩·唐斯和谢里·唐斯（Bryan and Sheri Downes），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爱和支持。当我取得成绩时，他们非常乐意分享快乐；当我遇到挫折时，他们会给予我鼓励，帮我重拾信心。身为一名教师和导师，我只希望我能做到我父亲那样，2001年退休时，他的学生们对他依依不舍，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塔尼亚·施赖伯（Tanya Schreiber）。这些年来，她不知疲倦，承受了太多压力。塔尼亚不仅是我写作中的参谋和顾问——我认为她能把我的观点阐述得更清楚——而且每当我觉得快要撑不下去时，都是她好言相劝，帮助我度过那些艰难岁月。不仅如此，她还身体力行地告诉我要咬牙坚持；身处逆境时，她能够沉着勇敢地面对。这给予我莫大的鼓舞，或许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谨以此书向她致敬。

引言

1

人们常说，战争就是地狱。“战争很残酷，你无法粉饰战争。”^①在阐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何要下令驱逐亚特兰大居民并纵火烧毁这座城市时，威廉·特库赛·谢尔曼（William T. Sherman）将军如是说。人们把战争视为地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会对无辜平民产生严重影响，除了吞噬战斗人员的生命之外，战争也会导致那些没有参与战斗的平民失去生命。例如，三个世纪以来，所有因战争而死亡的人当中，平民（我在本书中交替使用“平民”和“非战斗人员”这两个术语）死亡人数占了一半。据估计，仅在20世纪，就有4300万~4500万非战斗人员因战争而丧生，约占同期战争死亡人数的50%~62%。^②

100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仅仅列举其中几件就足以触目惊心。^③

① 引文来自 William T. Sherman, *Memoirs*, Vol. 2 (New York: Charles L. Webster, 1892), p. 126。数字来自 William Eckhardt, "Civilian Deaths in Wartime," *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 20, no. 1 (March 1989): 90; Zbigniew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Scribner's, 1993), pp. 9-10。埃克哈特指出，“就非武装人员死亡而言”，现代战争中大规模平民死亡“表明过去3个世纪以来战争都不是‘正义的’”。（同上，91）国家间战争中伤亡尤其严重，非战斗人员死亡人数大约是内战、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然而，在内战中，平民死亡比例是最高的，而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在上升。见 Ruth Leger Sivard,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Washington: World Priorities, 1987 and 1996), 28 and 17。

② 当然，迫害平民并非现代才有。从历史上看，迫害平民无疑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征服米洛斯岛后岛上男性遭到屠杀、岛上妇女和儿童沦为奴隶；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中罗马摧毁了迦太基；据马尔切利努斯伯爵说，5世纪中期，阿提拉和匈人的剥削“几乎把整个欧洲变成了尘土”；1099年耶路撒冷被十字军占领后遭到洗劫；13~14世纪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进行屠杀；在三十年战争中，800多万平民遭到杀害或被迫离开家园；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法国入侵东部边境上的德国州郡，造成严重破坏。法国保皇党起义（转下页注）

例如，20世纪初，数以万计的古巴、南非和菲律宾平民死于集中营，德国侵略西南非洲导致当地赫雷罗人几近灭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军队对同盟国实施封锁，造成大面积范围内民众营养不良，疾病蔓延，将近100万德国和奥匈帝国平民死亡，协约国实施封锁是罪魁祸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欧洲犹太人和数百万东欧和苏联平民，而盟军战略轰炸也造成30万德国人和90万日本人丧生。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战略轰炸造成数以万计非战斗人员丧生，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的反叛乱行动也造成数以万计非战斗人员死亡。在许多国家，国内冲突也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比如中国（1927~1949年）、西班牙（1936~1939年）、危地马拉（1966~1985年）、尼日利亚（1967~1970年）、埃塞俄比亚（1974~1991年）和安哥拉（1975~2002年）。《华盛顿邮报》2007年4月17日报道称，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已

（接上页注②）（1793~1796年）造成15万平民死亡；19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在爪哇岛、俄国人在高加索和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发动的殖民战争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关于这些事件，见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ex Warner (London: Penguin, 1972), p. 408; S. A. Cook, F. E. Adcock, and M. P. Charlesworth,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8, *Rome and the Mediterranean, 218 B. C. - 133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479 - 484; E. A. Thompson, *The Huns*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103; Paul K. Davis, *Besieged: 100 Great Sieges from Jericho to Sarajev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7 - 58; 关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见 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 Naomi Walford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关于三十年战争和17世纪晚期法国的破坏行动，见 John Childs, *Armies and Warfare in Europe, 1648 - 1789*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2), pp. 9, 152; 关于旺代叛乱，见 Anthony James Joes, "Insurgency and Genocide: La Vendée,"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9, no. 3 (winter 1998): 37; 关于荷兰人在爪哇岛，见 Micheal Clodfelter,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s: A Statistical Reference to Casualty and Other Figures, 1500 - 2000*, 2d ed.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2), p. 266; 关于俄国人在高加索，见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8 - 71; 关于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见 Sivard,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1987 - 1988*, p. 31。

经造成至少 20 万人丧生，超过 200 万人流离失所。^①

在现代战争中，平民伤亡数量之大触目惊心，这实在令人费解，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世人普遍认为屠杀无辜平民是不道德的。例如，国际红十字会最近在一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地区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64% 的受访者认为，在发动攻击以削弱敌方实力时，战斗人员只能攻击敌方战斗人员，绝不能伤害平民”。相比之下，仅有 3% 的受访者接受下面这种观点，即不仅应当允许交战方攻击敌方战斗人员，而且应当允许攻击敌方非战斗人员。^② 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美国人民的态度都非常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民坚决反对轰炸城区，因为这样做“违背了美国的人道主义理想”；针对 2003 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的民调显示，如果战争会造成“数千名”伊拉克平民伤亡，大部分美国人依然坚持反对发动战争的

① 平民死亡数字来自以下出处：四次殖民冲突，Clodfelter,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s*, pp. 345, 238, 272, 396；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封锁，Avner Offer, *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34, Leo Grebler and Wilhelm Winkler, *The Cost of the World War to Germany and to Austria - Hunga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147；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轰炸，Robert A. Pape, *Bombing to Win: Air Power and Coercion in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4, 272；纳粹屠杀，Benjamin A. Valentino, *Final Solutions: Mass Killing and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77, 81；轰炸朝鲜，Andrew C. Nahm,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Metuchen, NJ: Scarecrow, 1993), p. 129；越南和阿富汗，Guenter Lewy,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42 - 453, Marek Sliwinski, “Afghanistan: The Decimation of a People,” *Orbis* 33, no. 1 (winter 1989): pp. 39 - 56；内战，Valentino, *Final Solutions*, pp. 83, 88；达尔富尔，Colum Lynch, “Sudan to Allow U. N. Force in Darfur,” *Washington Post*, April 17, 2007, A16。

② Greenberg Research, *The People on War Report: ICRC Worldwide Consultation on the Rules of War* (Geneva: ICRC, 1999), 13, <http://www.icrc.org/web/eng/siteeng0.nsf/html/p0758>。这种思想早就出现了：早在 10 世纪末期，在教会制度和骑士制度中，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差别就已经开始形成，到了 17 世纪和 18 世纪，这种思想在格劳秀斯、洛克和瓦特尔的自然法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了。见 Richard Shelly Hartigan, *The Forgotten Victim: A History of the Civilian* (Chicago: Precedent, 1982), pp. 65 - 115。

立场。^① 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错误的，是违反国际法的，但是非战斗人员还是频繁遭到攻击，原因何在？

第二，人们普遍认为，在战争中杀害平民是下下策：这样做不仅对行凶者实现其意图毫无裨益，反而会更加坚定敌人抵抗的决心，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例如，一项最新研究认为，在战争中恐吓平民无异于自取灭亡：“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集团，对平民发动战争越是迅速、频繁、残暴无情，其利益就越容易受挫。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或集团都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② 一位研究国家间胁迫问题的权威分析员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针对敌方平民的惩罚性战略很少能够取得重大让步。^③

既然迫害平民在道义上会受到谴责，其效果也存疑，为什么有些国家仍要实施攻击敌方非战斗人员的军事战略呢？^④ 有一派观点认为政权形式是关键因素，但是对其实际效果莫衷一是。也有分析员认为，民主国家攻击平民的可能性比非民主国家小，因为民主国家遵守国内法规，不论攻击对象是本国平民还是外国平民，一律禁止屠杀无

① George E. Hopkins, "Bombing and the American Conscience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Historian* 28, no. 3 (May 1966): 453; "Bush Performance Rating Climbs Back to Low 60s; Americans More Hawkish Over Iraq But Still Considerably Reluctant, Newest Zogby America Poll Reveals," http://www.zogby.com/news/ReadNews.dbm?ID_675, February 9, 2003.

② Caleb Carr, *The Lessons of Terror: A History of Warfare against Civili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p. 12.

③ Pape, *Bombing to Win*; Robert A. 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no. 2 (fall 1997): 90-136. 见 Michael Horowitz and Dan Reiter, "When Does Aerial Bombing Work? Quantitative Empirical Tests, 1917-1999,"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5, no. 2 (April 2001): 147-173; 和 Ivan Arreguín-Toft, "The [F] utility of Barbarism: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Systematic Harm of Non-Combatants in 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PA, August 2003. 关于制裁的潜在破坏力，见 John Mueller and Karl Mueller, "Sanctions of Mass Destruction," *Foreign Affairs* 78, no. 3 (May/June 1999): 43-53.

④ 在本书中，我关注的是交战国在战争中迫害外国平民，而不是战争期间或平时时期交战国如何对待本国境内的非战斗人员。这类人员包括在国家间战争期间居住在敌国的平民，或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或殖民战争中被占领的非国家领土上居住的平民。

辜平民，而非民主国家根本不受国内法规的约束。^①然而，针对民主制度和战争两者关系的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民主国家攻击非战斗人员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容易受民意左右。由于害怕失去国内支持，他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战争可能带来的惨重代价。^②为了降低战争成本或迅速打赢战争，民主精英们不得不考虑攻击非战斗人员。

第二种解释强调了敌人的“野蛮”身份：之所以迫害平民是因为他们认为敌人尚未开化。^③例如，斯巴斯蒂安·鲍尔弗（Sebastian Balfour）在研究西班牙征服摩洛哥北部这场战争的书中写道，欧洲列强“区别对待……欧洲人民和抵抗欧洲侵略的殖民地人民。适用于殖民地敌人的战争标准有所不同，因为殖民地敌人没有‘完全开化’”。^④换句话说，选择何种战略取决于自己如何看待敌人。在战争

① Michael J. Engelhardt, "Democracies, Dictatorships and Counterinsurgency: Does Regime Type Really Matter?" *Conflict Quarterly* 12, no. 3 (summer 1992): 52 - 63; R. J. Rummel, "Democracy, Power,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9, no. 1 (March 1995): 3 - 26; Arreguin - Toft, "The [F] utility of Barbarism"; Robert A. Pape,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no. 3 (August 2003): 343 - 361; 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State, Society, and the Failures of France in Algeria, Israel in Leban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Benjamin Valentino, Paul Huth, and Dylan Balch - Lindsay, "'Draining the Sea': Mass Killing and Guerrilla Warfa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8, no. 2 (April 2004): 375 - 407. 乔治·布什总统支持这种观点。2002年，他宣布“谋杀无辜平民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错误的”，他还声称公平战斗是民主国家区别于流氓国家、恐怖分子和野蛮人之所在。见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Bush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White House, 2002)。

②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no. 4 (December 1999): 791 - 807; Dan Reiter and Allan C. Stam, *Democracies at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Mark B. Salter, *Barbarians and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luto, 2002), pp. 36 - 39.

④ Sebastian Balfour, *Deadly Embrace: Morocco and the Road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23.

中，交战规则只适用于“文明的”敌人，而不适用于“野蛮人”。

第三类观点专注于研究军事组织。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组织文化——定义为“某种观念、理念和信仰，这些观念、理念和信仰决定了一个群体应当如何适应外部环境，以及如何管理内部事务”——才是决定一支军队是否会迫害平民的关键因素。^① 确切地说，如果一支军队的组织文化已经决定他们要采取攻击平民的战略，那么在战争过程中交战国就会故意杀害非战斗人员，有时候甚至会实施种族灭绝战略。^②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某个军种认为攻击平民有利于本军种的狭隘利益，那么他们也会攻击平民。如果多个军种相互竞争，都希望为战争胜利做出最大贡献，从而在战后军费分配时获得最大份额，或者如果某个军种企图从其他军种中独立出来，组建一个独立军种，那么他们也可能攻击平民。^③

虽然这些观点看似很有道理，但是证据并不支持：本书会向大家证明，虽然民主国家攻击平民的可能性比非民主国家更大，但是并非只有民主制度才是主要驱动因素。而且，不同国家之间原本就存在文化差异（如种族或宗教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可能会造成交战国认为敌人属于“野蛮人”，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能解释迫害平民的原因。组织文化或部门狭隘利益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攻击非战斗人员的原因。

本书对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国家间战争和殖民战争进行了调

① Jeffrey W. Legro, “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ting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no. 1 (winter 1997): 35.

② Jeffrey W. Legro,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I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abel V. Hull, *Absolute Destruction: Military Culture and the Practices of War in Imperial German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有时候人们用这个论点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队升级轰炸手段的原因。见 Michael S. Sherry, *The Rise of American Air Power: The Creation of Armagedd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09; Conrad C. Crane, *Bombs, Cities, and Civilians: American Airpower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3), p. 129.

查，在此基础上，本书认定以下两点是造成迫害平民的主要原因。第一，在成本高昂、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打赢战争和挽救本国人民生命的迫切渴望会导致交战国攻击敌方平民。按照这个逻辑，那些卷入成本高昂、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的国家会越来越渴望打赢战争，同时减少自身的损失。如果发现自己陷入这种困境，这些国家就会攻击非战斗人员，因为这样做使他们可以继续战斗，可以减少人员伤亡，还有可能迫使对方放弃战斗从而打赢战争。简而言之，在战争中，交战国——包括民主国家——往往会把打赢战争和挽救本国人民生命看得比人道主义更重：禁止屠杀非战斗人员的道德禁忌在迫切渴望胜利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在消耗战中，因迫切渴望打赢战争而迫害平民基本上不是为了消灭受害者群体。^① 恰恰相反，在消耗战中，攻击非战斗人员主要是一项胁迫战略：这是一种手段，旨在说服敌方政府（在常规战争中）或叛乱团体（在游击战中）接受胁迫者的政治或军事要求。作为一种胁迫手段，迫害平民有惩罚逻辑或拒止逻辑两种形式。^② 一方面，按照惩罚逻辑，对非战斗人员实施暴力是希望他们起来反抗，要求本国政府结束战争。换句话说，为了惩罚而迫害平民是为了削弱敌方平民的抵抗意志。在包围战、海上封锁和战略轰炸城区时，对非战斗人员实施暴力基本上是惩罚逻辑在背后支撑。

另一方面，按照拒止逻辑，迫害平民是为了削弱敌方的军事实力。例如，在反游击战中，杀害支持敌方的平民（或者直接将平民从目标区域撤离出去），对其他平民实施恐吓，要求他们不要向叛乱

① 大量学术文献认为大多数杀害平民的事件都构成了大屠杀或政治屠杀，都企图“全部或部分消灭某个公社化、政治或政治化族群”。例如，Barbara Harff, “No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Holocaust? Assessing Risks of Genocide and Political Mass Murder since 195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no. 1 (February 2003): 58。

② 关于这些类别，见 Pape, *Bombing to Win*, pp. 55–79。

组织提供支援（或者干脆阻止他们提供支援），从而削弱叛乱组织的后勤保障能力，使其无法继续战斗。有时候就连轰炸行动也是为了屠杀平民工人，从而削减敌方的军工生产。作为一种胁迫手段，迫害平民通常是后发制人的手段，因为胁迫——不论是惩罚胁迫还是用拒止胁迫——都不能很快奏效。^① 因此，交战国通常在战争后期才会采用胁迫手段，而且只有在设想迅速打赢战争的初期战略失败之后才会采用。

第二，交战各方对征服领土的欲望：交战国企图征服并吞并敌方非战斗人员居住的土地。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领土扩张战争中，如果同一块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这些族群都声称该领土为其所有，并且族群之间发生敌对行为时，这种情形通常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敌方平民通常具有战略意义，因为这样做既能消灭可能在军队后方发起叛乱的“第五纵队”（即内奸），又能够阻止日后发生暴动。而且，清除敌方平民人口能够降低未来敌方试图收复争议领土的可能性，排除了可能引发战争的重大隐患，即营救被困在敌国境内的民族同胞。另外，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会增强某一方对领土主权的诉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群的民族属性。例如，科索沃地区 90% 以上的人口是阿尔巴尼亚族，这使得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宣布在科索沃实行自治的呼声增强，也让人觉得这种诉求合情合理。如果交战国企图征服对方领土，他们就会攻击对方平民，从而改变当地人口结构，上述每个因素都有可能促使这种情况发生。

为吞并邻国领土而迫害平民（而不是因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迫害平民）往往会先发制人，而不是后发制人。原因在于侵略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击敌方平民，驱逐或者杀害平民既能消除后方发生叛乱的威胁，又能排除敌方平民日后营救其同胞的可能性，而且还能

^① Pape, *Bombing to Win*, pp. 32 – 35.

巩固侵略者对土地的所有权，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此外，即使是在胜利在望或者战事进展顺利的情况下，交战国也可能迫害平民，这么做不是因为交战国迫切渴望打赢战争，而是因为他们企图吞并敌国领土。

在战争中，交战国可能会迫害敌方非战斗人员，民主政权形式本身就会增加这种可能性。乍一看，民主国家攻击平民的概率似乎略高于非民主国家。但是，这种差异是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更喜欢对平民使用武力造成的。除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以外，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在攻击非战斗人员的偏好方面没有任何区别。证据表明，如果民主国家领导人发现陷入了成本高昂的战争或即将输掉战争，民主制度的某些因素，如选举问责制度产生的额外压力，可能会迫使领导人采取措施（包括迫害平民）来减少损失或取得胜利，即便这些措施违背了自由规则。这暴露出了“民主的阴暗面”：为什么那些旨在维护和平与安宁的制度反而会造成民主国家在国外作恶呢？^①这也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民主国家特有的规则和制度在战争中不是相互补充，而是相互矛盾。

只有确信攻击平民战略会取得成功，迫害平民才算是理性的选择吗？领导人大可不必这样认为；领导人只需要相信这样做有助于打赢战争、避免失败或者降低战争成本就行了。领导人也可能会认为，只有攻击非战斗人员才能实现战争目的，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果迫害平民有助于扭转严峻局势，或者能够以可以承受的代价实现国家目标，那么即使希望渺茫，领导人也可能会理性地抓住这个机会。因此，一旦交战国致力于赢得胜利，如果战争成本不断增加，或者战争

^① 这个短语来自 Michael Mann,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迈克尔·曼发现了民主的另外一个阴暗面，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实体认同某个特定族群时就会出现。政治实体与特定族群的重叠会把其他族群视为外来者，这最终可能导致暴力清洗。